

方立天文集

第四卷

- 第一卷 中国佛教  
第二卷 魏晋南北朝佛教  
第三卷 法藏与《金师子章》  
第四卷 佛教哲学  
第五卷 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  
第六卷 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第七卷 中国佛教文化  
第八卷 中国文化与中国宗教  
第九卷 中国古代哲学（上下）  
第十卷 杂著

佛教哲学







● 1993年秋，与夫人郑品安，摄于人大图书馆前。



● 2005年12月，与夫人郑品安在重庆大足石刻前留影。



● 1994年秋，与首届博士毕业生张风雷合影。



● 2006年3月，在云南腾冲参加“普贤与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时与早年研究生合影。左华方田，右俞学明。



● 2000年夏，与部分研究生黄德远、朱岚、王公伟、彭自强等在一起。



● 2009年，与博士生合影。左起：金刚、谢军华、魏农、杨勇、韩剑英、牛延锋。



● 2010年春，与部分博士毕业生合影。前排左一朱岚，右二俞学明。后排左起：刘威、张风雷、华方田、谢路军、魏德东、韩剑英。



● 2011年9月17日，在学术研讨会上接受早年研究生徐绍强、俞学明献花。

这部集子的缘起是，今年（2011）9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茶歇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出版社社长贺耀敏教授和我面谈，约我重新编一部个人文集出版。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我的五部专著和六卷本文集，现在又约我重编一部文集出版，对于人大出版社的这种盛情雅意，我极为感动，深为感激。

五年前出版的六卷本《方立天文集》，约结集了我的一半著述；现在这部文集，收集了迄今为止我撰写的绝大部分作品，并根据著作的性质，分别按中国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法藏与《金狮子章》、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佛教文化、中国文化与中国宗教、中国古代哲学以及杂著等不同内容，统编为十卷十二册，约五百万言。十卷本比六卷本增加了约一倍的篇幅，新增内容是《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卷二册，中国佛教和中国佛教文化新增的文章较多，各成一卷，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宗教的著述则合成一卷，杂著一卷包括多年来撰写的序言、前言、创刊词、书评、追念前贤、治学等内容。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先后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1987）、《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哲学大辞书》（辅仁大学出版社，1993年后陆续出版）、《孔子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中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等，撰写过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的条目。《中国哲学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中的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部分为我所写，《中华的智慧——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精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一书，我撰写了葛洪、僧肇、法藏、慧能、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七篇。这些为集体著作撰写的稿子，均不收入本文集中。此外，有一些与他人合作而非我执笔的文章也未予收入。

新编十卷本文集的内容，反映了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探索的方方面面，记录了我漫长学术生涯的前进足迹，也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展示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折射出了社会和时代的变迁、进步。借此作序的机缘，回顾和总结个人学术生命的历史因素、生涯规划、耕耘布局、治学方法、主要收获、经验教训以及人生体悟等，是我十分有兴趣的。

1949年我初中毕业。不久，家乡（浙江永康）解放。1950年春，我到上海，在华东税务学校（后与华东粮食学校合并，更名为华东财政学校）学习，随后留校工作。约在1953年，我由从事行政工作转为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先后讲授或辅导过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教学过程中，我逐渐对哲学的思辨性、抽象性产生了兴趣，幻想日后能遨游在自由的思维天地之间。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年轻在职干部报考高校，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从此我的生命开始真正和哲学结缘。学习期间，我又对中国哲学最为喜好，内心默默地许下的心愿，期盼毕业后能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61年北京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这为我实现从事中国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夙愿提供了最佳的舞台。此后，我又想中国哲学历史很长，必须确立一个时段作为研究重点。经过反复思考，我确定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哲学



为学术研究的重心。这一时期的哲学广泛涉及儒家、道家、道教和佛教等多个领域，我又选定其中的佛教哲学作为研究重点。我之所以这样选择，一是深感佛教哲学内涵丰富，与中国文化、哲学的关系密切；二是受家乡、家庭传统佛教信仰的影响，对佛教有一种自然的亲和感；三是在治学取向上，个人比较偏爱冷门，好攻难点，不畏艰苦。也就是说，理智的判断、情结的作用和性格的特征，决定了我开始研究当时被喻为“险学”的佛学，且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永不走回头路了。

经过上世纪60年代初数年间的探索、运思、实践，我确定了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交叉结合、互动互补的佛教学术研究方案，并粗略地制定了近期、中期研究规划和长期目标。个案研究主要是佛教代表人物的研究。我认为，一部佛教史就是佛教代表人物和广大信徒的信仰修持史，一部佛教思想史主要是佛教代表人物的思想成果史。研究历史上的佛教代表人物，就能展示佛教尤其是佛教思想演变、发展的途径和内容。根据这一思路，我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代表人物如道安、支道林、慧远、僧肇、道生、梁武帝萧衍等着手开展佛教的研究。在日后的研究中，也始终倾心于对不同佛教代表人物如华严宗创始人法藏、禅宗创始人慧能等的关注和研究。

佛教文献是佛教思想研究的基础，把握佛教文献的文字、结构、内涵、实质，对于佛教思想的研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在整个佛教研究工作过程中，我比较重视资料的积累，参加了《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3—1992）的整理工作，并对部分佛教文献做了标点、校勘、注释、今译，有的已整理成书出版。

在若干个案微观研究和一定资料积累的基础上，上世纪80年代，我又开展了对佛教的宏观研究。重点工作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佛教哲学的整体研究，也可以说是佛教哲学的现代化研究。我撰写了《佛教哲学》一书，在书中我着重论述了佛教的人生价值论、宇宙论（要素论、结构论、生成论和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丰富内涵，力求用现代语言表述佛教哲学理念，运用现代的多元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并力图立足当代社会背景，发掘和评判佛教的价值与弊端，贡献与缺陷。二

是佛教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可以说是佛教文化的中国化研究。在《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专书和《佛教中国化与中国化佛教》等有关论文中，我把佛教中国化界定为“三化”，即民族化、本土化和时代化，并叙述了佛教中国化的不同阶段、途径和方式，还通过与中国的政治理念、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民间信仰、社会习俗等的互动关系，揭示出佛教中国化的实质，总结出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的六个重要特点：重自性、重现实、重禅修、重顿悟、重简易、重圆融。

我研究佛教秉持的是“中国本位”立场，我认为中国人是以先前本国文化结构去理解佛教的，是以中国人的实际需要和精神需求去对待佛教的，是以中国儒、道本土文化去改造佛教的。也就是说，我是在中国文化、思想、哲学的演变、发展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中国佛教文化、思想、哲学的流传、兴衰。因此，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也分外重视对中国哲学的研探，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撰写了《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我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目的，其一是为了阐扬中华智慧，其二就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佛教哲学。

在以上微观和宏观的学术研究取得相应成果的基础上，我开始全力专攻自己学术生命中的“重点工程”，开展对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系统、整体研究。我从中国僧人的佛教著作出发，在与中国儒道思想、印度佛教思想的互动、比照中，千淘万漉，吹沙觅金，历时十五年，先后撰写百余篇文章，尔后形成了九十余万言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一书。全书设为绪论、总论、人生论、心性论、宇宙论、实践论（修持论）和结语七个部分，除绪论和结语外的五编三十二章为全书的主体，心性论与直觉论为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两大要点，由此而初步构筑了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体系。在该书的“绪论”中，我分述了研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具体方法：结合现代哲学发展的要求，筛选、归结中国佛教的重大哲学问题，构筑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体系；运用现代语言，诠释中国佛教哲学的概念、范畴；寻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原来意义；体会中国佛教某些哲学语言的言外之

意；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规律；总结中国佛教哲学理论思维成果；进行比较研究，以把握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特色；阐发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与意义。这八条是我的中国佛教哲学问题研究方法的初步归纳和总结。

从上述可见，我对佛教的研究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中国佛教思想家的个案研究、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佛教哲学的现代化研究、佛教文化的中国化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体系的构筑。这五个方面的研究，大体上体现了我的佛教研究轨迹，构成了我迄今为止学术生涯的基本内容。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我的学术视野有所扩大，研究领域也有所延伸。在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双耕”的基础上，我对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国宗教理论产生了兴趣，并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做了一些探求性和探讨性的研究。

探求中华文化精神，是为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此我撰文探求中华文化的传统和核心问题，提出了中华文化三大传统（儒家的人本主义、道家的自然主义、佛家的解脱主义）的看法，并认为人生价值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人文精神即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式、态度、思想、观点是中国国学之魂，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还强调思维方式对一个民族思考问题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宗教理论领域，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正确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着特殊的重要的现实意义。我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归结为宗教本质观、宗教价值观、宗教历史观和宗教适应观。我认为，对宗教的本质和功能缺乏科学认识，会导致宗教学和宗教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长期以来在宗教领域里流行的是“鸦片论”和“斗争论”，而毛泽东主席生前多次指出宗教是文化，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又积极倡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出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命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主要脉络，就是从“鸦片论”、“斗争论”发展为“文化论”、“适应论”、“引导论”，这是中

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领域的最伟大的理论创新，最重大的理论贡献；这对于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

清代散文家姚鼐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义理”，指的是研求经义、探究名理的学问。回眸以往岁月，我在中国国学这块丰腴的田野里默默耕耘，主要是走探索义理之路，也就是着力探索中国哲学思想，尤其是中国佛教哲学思想。这是一个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求真过程，也是一个体悟智慧、增长智慧的求智过程。每当回忆起驰骋独立思考、直抒胸臆的心路历程；每当回想起爬梳剔抉、笔耕凝道、学思有得、开心明目的收获时刻；每当联想起漫漫人生征途，深涧、峻岭，大川、坦途，独木小桥，阳光大道……此时此刻，不免心潮澎湃，难以自己！

光阴荏苒，人生无常。虽然如今我已近耄耋之年，但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今后我仍将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争取有所撰述，从而为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做出自己绵薄的贡献。

在即将结束序文时，我要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教授的盛情约稿，我还应该深深地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杨宗元、李红、符爱霞、吴冰华、吕鹏军、许微微、胡明峰诸同志，感谢他（她）们认真、细致、严肃的编辑工作态度。没有他（她）们的辛勤劳动，这部文集在半年时间里出版问世，是不可想象、绝无可能的。

## 方立天

2011年12月8日初稿，19日定稿

|                    |     |
|--------------------|-----|
| 增订本前言              | 001 |
| 前 言                | 004 |
| 第一章 佛教哲学的构成和流派     | 007 |
| 第一节 佛教、佛法与佛学       | 008 |
| 第二节 佛教哲学的构成        | 009 |
| 第三节 佛教哲学的基本流派      | 013 |
| 第二章 佛教哲学的历史演变      | 017 |
| 第一节 印度佛教哲学略史       | 017 |
| 第二节 中国佛教哲学略史       | 030 |
| 第三章 佛教哲学的重要著作      | 047 |
| 第一节 佛典概论           | 047 |
| 第二节 印度佛教哲学的重要著作    | 049 |
| 第三节 中国佛教哲学的重要著作    | 055 |
| 第四章 佛教的人生价值论       | 060 |
| 第一节 四圣谛说           | 060 |
| 第二节 三法印说           | 100 |
| 第五章 佛教的宇宙要素论       | 110 |
| 第一节 三科——五蕴、十二处、十八界 | 111 |
| 第二节 五位七十五法和五位百法    | 115 |

|                     |     |
|---------------------|-----|
| 第六章 佛教的宇宙结构论        | 135 |
| 第一节 三界与佛土           | 136 |
| 第二节 三千大千世界          | 143 |
| 第三节 有情世间            | 145 |
| 第四节 成住坏空与无始无终       | 147 |
| 第七章 佛教的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上） | 150 |
| 第一节 因果论             | 152 |
| 第二节 业感缘起论           | 159 |
| 第三节 中道缘起论           | 163 |
| 第四节 赖耶缘起论           | 171 |
| 第五节 六大缘起论           | 177 |
| 第八章 佛教的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下） | 179 |
| 第一节 真如缘起论           | 179 |
| 第二节 性真实相论           | 188 |
| 第三节 法界缘起论           | 191 |
| 第四节 自心顿现论           | 202 |
| 第九章 佛教的认识论（上）       | 205 |
| 第一节 总论              | 205 |
| 第二节 禅观              | 209 |
| 第三节 依根缘境生识说         | 212 |
| 第四节 般若中观论           | 217 |
| 第五节 四分、三性与四智说       | 233 |
| 第六节 新因明与量论          | 241 |
| 第十章 佛教的认识论（下）       | 251 |
| 第一节 般若无知论           | 251 |
| 第二节 顿悟成佛说           | 256 |
| 第三节 四重二谛与般若无得       | 260 |
| 第四节 三谛圆融与真妄心观       | 266 |
| 第五节 禅悟              | 275 |
| 结 语                 | 297 |
| 佛教“空”义述评            | 302 |

## 增订本前言

早在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约我写一本简要介绍佛教的学术性通俗读物，结果形成的是约17万字的《佛教哲学》。该书于1986年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出版社的负责同志又建议我，在原书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增订。这是符合我的愿望的，我很高兴有机会补充我原打算写而没能写上的一些内容，弥补某些缺憾。

有关这次增订的内容，大体上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增加了介绍佛教认识论的内容。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设为两章，分别论述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认识论，对佛教认知系统的方法、方式、过程、标准和特色等基本内容进行了扼要的阐述。这是此次增订的重点所在。我用了约10万字的篇幅来论述原本想写而未写的问题，使《佛教哲学》一书的容量得以扩大，内容得以充实。这样，除了介绍佛教哲学的构成、流派、历史和著作外，还从佛教的人生论、宇宙论和认识论三个方面揭示了佛教哲学的内涵，大致地勾勒出了佛教哲学的体系，这对于读者的帮助也许会更大一些。

第二，适当地增补了论述人生哲学的内容。主要是从人类生存发展史的角度，运用价值论的观念，分别阐述了佛教对人生价值、人生理想价值，以及如何实现人生理想价值等方面的基本看法。希望读者能从中比较准确地把握佛教人生哲学的根本要义。

第三，对原书的宇宙论部分也作了适当的调整。有些内容或移入了认识论部分，或略作补充，以求各有关部分的相对协调、平衡。

此外，还对原书的疏漏舛误之处尽可能地作了补充修正。

毋庸讳言，笔者撰写《佛教哲学》是着眼于现实的理论及有关实践的需要。在中国以往的历史舞台上，各种宗教都以其独特的面貌扮演过不同角色。在这些宗教中，我以为历史作用最大的还数佛教。中国佛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侧面，中国佛教文化已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样，中国佛教哲学也是中国哲学的十分重要的内容。中国佛教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长期地积淀在中华民族的心理意识结构之中，成为一种强大的传统力量。这种佛教传统文化及其哲学在当前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在中外文化交流和比较中的地位如何，都是我们有关工作者应当重视的现实问题。我希望《佛教哲学》增订本的出版，能够对读者在宏观上把握佛教哲学思想有所帮助，并进而有助于正确对待和处理佛教与现代化、佛教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萧萐父教授和郭齐勇教授在评论拙著《佛教哲学》的《佛教哲学研究的现代化》<sup>①</sup>一文中，强调了“佛学研究现代化”的重要性，这确是真知灼见。他们在文章中指出，佛学研究的现代化要求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述佛教的内容，以便使人们了解其思想实质。对重要的佛教典籍的整理，也应当在校点、注释的基础上进行今译。又指出，佛学研究的现代化，要求用现代的多元方法对佛教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如“运用现代的心理學、人类学、文化学、价值学、符号学、诠释学、系统论、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语言哲学的方法等等，我们将可以从各个侧面发掘出不曾为人们认识的佛家文化的价值，并产生出丰富多样的佛学研究新成果。方法多元，成果多样，是佛学研究现代化的需要。如果我们借鉴新方法，变换一下参照系，不仅可以把佛学约化为认识史、范畴史，还可以从文化史、比较文化和中外关系史等角度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还可以专门研究佛教中的自然科学、医

<sup>①</sup> 载《中国图书评论》，1987（3）。



学、音乐、美术、建筑艺术、文学、语言、音韵及其传播等等”。同时还提及了佛学研究的现代化，要求立足于新的时代和社会背景，运用现代科学观点发掘和评判佛教的价值或弊端，贡献或缺失。萧、郭两位所讲的这些确实是十分艰巨复杂而又有重要意义的科学工作，笔者也有志于此道，然而自知离佛学研究现代化的要求相距尚远，今后应坚持不懈地努力追求。

《佛教哲学》问世后，得到了师友们的鼓励。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赐函，谓该书可以作为“了解佛教的入门书”。此书后来还经过评选，获得1986年“中国图书奖”荣誉奖。这些都是对我的巨大鞭策，推动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在写作过程中，我曾广泛参阅了前辈学者如梁启超、汤用彤、陈垣、陈寅恪、吕澂和胡适等先生的有关著作，其中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吕先生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对我启发尤多。本书在引用他们的论点和资料时，凡重要和突出者均随文注明，但限于本书的体例，有些则为照顾阅读的方便而没有一一加注，这是我要特意声明的。

在我增订本书的过程中，又一次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石峻教授和王颖编审的热情帮助，谨此致谢。

本书虽经过这次增订，但缺点错误还是不少，希望读者不吝指教。

作 者

1988年6月10日于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